

南开精神
救國與興國

丁潤生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二〇〇五年

南开精神 救国与兴国

丁润生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二〇〇五年

南開精神：救國與興國

丁潤生著

責任編輯 舒携溺 封面設計 谷江
封面題字 汪宗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號三樓

電話：二六七〇六六三三

定價 港幣二十四元

人民幣二十四元

二〇〇五年五月初版

序

抗日战争后期，我和丁润生同志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他十分敬仰南开的创始者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孜孜不倦地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亲自加以实践；1993年创办重庆树人大学（学院），为民办教育贡献力量。从润生的研究和实践两方面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民办教育的倡导者、研究者和实践者。

他的论文集《南开精神：救国与兴国》，正如书名所显示的，主要由两部分构成：教育救国与教育兴国。从前者看，他精研张伯苓教育思想和实践，写出不少有深度的教育学术论文，大多在有关学刊上发表过。从后者看，他研究如何继承和发扬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中国古代教育，还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办学途径，提出不少具有教育闪光的论点。除上述两大部分外，还附有润生写的部分杂文和回忆——这些都以育人为中心，反映出他毕生为教育而奋斗的高尚精神。他还将这本论文集作为迎接张伯苓先生诞辰130周年、喻传鉴先生忌辰40周年和重庆南开中学创办70周年的一份献礼。

润生同志长期不懈地研究张伯苓教育理念和治校精神，有创见、有深度，并非泛泛而论。在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向读者朋友们介绍。

1. 从新的角度对张伯苓“英才教育思想”作了全面分析。润生在《张伯苓英才教育思想探析》一文中指出：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中学，首先是“优选”，即选择优秀的青少年进校学习。其次是“优育”，即给以最好的教育，使他们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才。最后，以上“优选”、“优育”与突出教育创新分不开，和建立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密切相关，也离不开严格要求和加强管理。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觉得是符合张伯苓教育思想的。至于张伯苓英才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润生的论

文这样分析：“对精英们实施‘英才教育’与大众化的全面素质教育有密切联系而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它们都要重视个性的全面发展和德智体诸方面的素质教育，都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综合国力，二者之间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2. 记述张伯苓最早重视我国西部人才培养。润生所著《张伯苓对西部智力与人才开发的贡献》一文，资料丰富翔实，分析深刻到位。几年前我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研究不足，拙文《未完成的课题——张伯苓先生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研究》曾经提出张伯苓先生为什么选择四川重庆为南开中学所在地？后来读到润生的上述文章，我提出的问题才得到全面的解答。润生在其论文中的结尾这样写道：“张伯苓创办重庆南开中学，推广南开精神，接办自贡蜀光中学，为国家社会培养大批人才和精英等方面的特点和作用，表明了他对开发西部智力与人才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他的确是 20 世纪中国办教育当之无愧的‘状元’，是‘教育界公认的一位领袖’，他是进行西部大开发的先驱。”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3. 润生的《传统书院与民办高校的对比研究》具有新意。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和九十年代，我国学界关于传统书院的研究有很大进展。不但有相关资料的积累，而且在研究上有一定深度，至于将传统书院与民办高校对比研究，润生可说是这方面的开创者之一。润生所说的“对比”面相当宽，有办学精神对比、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对比等等，这样的对比使读者一目了然。当前民办高校与传统书院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也有本质的区别，润生的结论是：“中国民办高校前进的道路虽然艰难崎岖，充满风险，但我们相信：汲取现代知识经济新智慧的民办高校的创业者们，必将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地持续攀登，使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高教事业在 21 世纪重放异彩，再造辉煌。”我很赞同润生的这个预测。

以上我只是举例从三个方面说明润生在我国教育研究方面的成果，事实上并不只是这么几点，这本书共有四十多篇文章，约 25 多万字，读者看了这本论文集将获得全面的印象。

我还想提到，润生同志对我国传统教育深有研究，特别是对孔子

教育思想与《周易》一书的研究尤为精到。他至今仍兼任树人学院易学研究所所长，在海外出版的《管理之道》及《中华易学》等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有一定影响。

丁润生同志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人，兴趣广泛，他不但精研教育问题，而且经常以诗词述怀。2003年他的诗钞《不稀集》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他的《七十抒怀》：“人生七十不稀奇，编选诗钞名不稀，毫耄续诗且做文，待活百岁出稀集。”这就是润生同志的精神，值得学习。是为序。

张岂之

2005年元月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弁言：何以冠名南开精神

这本书名叫《南开精神：救国与兴国》。细心的读者翻阅目录，只会见到多数篇目谈的是教育救国和科教兴国，与南开学校相关的只占少数，直接谈南开精神的只有几篇。何以冠名“南开精神”在前面呢？有的南开校友可能觉得：似有“拉大旗作为虎皮”之嫌；有些非南开校友或许认为：谈救国兴国就谈教育与科技吧！何须牵涉到南开精神呢？为此，有必要在前面作点说明。

原来南开精神确实是指南开系列学校师生们办学和治学之道，或可称之为原始的、基本的南开精神。以后随着南开学校的日益成长和发展，南开精神也相应地不断开拓和提升。近百年间的两朝执政当局，都曾公开表示要发扬南开精神。早在1937年7月，当天津南开学校被日军炸毁以后，执政党的《中央日报》曾发表社评，认为南开精神“表现了东亚正统文化的精神”，号召“全国同胞要发挥张（伯苓）先生讲的南开精神”。57年后南开学校90周年校庆之际，1994年10月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央“四大班子”领导人的题词，直接或间接地号召弘扬南开精神。这些表明南开精神已经超越了时代和政见。它不再局限于教科文领域，已经升华成为鼓舞各行各业人士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遍及全国的泛南开精神，或如蒋介石先生所言：“有中国就有南开”；或如周恩来、温家宝先生所说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都是指这种广义的泛南开精神。

按照语言逻辑学的基本规则：一个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成反比关系。“南开精神”这个词也一样。“原始的开南精神”，只局限于南开系列学校这个较小的外延，其内涵就很丰富：既有日新月异、允公

允能的校训，又有求真务实的学风和苦干傻干的作风，以及团结凝聚的校风等等。其长处是生动、活泼、多样化，其不足是复杂、繁冗、易含混。比如过去南开规定：“男生全剃光头，女生发不过耳”，似不宜作为南开精神在今天推广；又如有的把“南开人团结凝聚”强调得过头了，则又可能有“扎堆”搞小圈子之嫌。另一方面，“广义的泛南开精神”处延扩展到全国，其内涵必然缩小，只剩下“爱国”、“革命”等几个高度抽象化的概念，虽然伟大崇高，但又往往易流于大而无当或高不可攀，难以具体地贯彻实施。故此书对原始的和广义的泛南开精神都只是略有涉及，重点在于取其中道，尽量做到“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把抽象的“爱国精神”与笔者较熟悉的办学兴学等教育活动结合起来。这样就不仅只写南开学校，还要提到清华、树人等私立（民办）院校乃至民办书院。既要发扬南开教育救国和科教兴国的好传统，也要联系和揭示当前教科文领域中背离南开精神的一些弊端乃至腐败现象。书中各篇的观点仅是个人一孔之见，所引材料也是挂一漏万。难免有偏颇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教。此书只是一块引玉之砖，期望有更多关心文化教育和科技的读者们参加对南开精神和救国与兴国的研究和讨论，以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更加健康稳健发展。

末了谨将此书献给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 130 周年诞辰、和中等教育家喻传鉴先生 40 周年忌辰，以及他们创办的重庆南开中学 70 周年校庆。

著 者

2005 年 3 月于松林坡

目 录

序	III
弁言：何以冠名南开精神	VII
张伯苓对严复教育救国的继承和超越	1
南开精神的演进过程及其与物质关系试探	12
张伯苓英才教育思想探析	23
张伯苓对西部智力与人才开发的贡献	34
允公允能的提出及其现实意义	41
张伯苓是 20 世纪中国办教育的领头人	51
略谈张伯苓青春期教育的特点	62
喻传鉴先生的办学思想	68
树人之道重在提高人的素质	73
批判旧教育 倡导新教育	76
抗日时期内迁院校与西部开发	82
陈立夫对中国抗日时期教育的积极作用	99
纪念跨世纪的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	106
从南开校歌看孔子教育思想的生命力	109
教育劳动的主要产品是人才	113
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121
精英型与大众型教育的关系及其思维误区	128
“活教育”是切中教育时弊的良方	139
传统书院与民办高校的对比研究	152

“宽进严出”是民办院校生存发展的战略原则	165
从“管理”到“促进”的超越	173
高考作文的主要任务是选拔创新型人才苗子	180
五行思维训练与全面素质教育	189
思维训练应当列为终生教育的重要课题	204
走出培养儿童个性发展中的误区	208
清华校徽体现孔子君子人格的魅力	215
在南开精神指引下并肩前进	222
杰出的南开英才 可贵的老教育家	225
竟张伯苓校长未尽之业	231
聚会欢乐应思源	235
难忘的教诲	237
回顾重庆树人大学的创办历程	241
充分利用教育资源 优势互补并校办学	246
端正思想 尊重知识 加强领导	248
创新人才匮乏的危机	250
与其复读 不如留级	254
二元差别被强化和扩大	257
“马太效应”与教育公平	260
农村儿童没有受到平等的义务教育	263
四分之一公民权的二等公民	265
甲申三百六十年前的历史教训	268
《甲申文化宣言》的要害是拒斥先进文化	270
附录：执 着 追 求(273) 诗词若干首(补白)	
跋：让南开学的研究更加广泛深入	275

张伯苓对严复教育救国的继承和超越

内容提要：本文在简介严复教育救国的思想与活动基础上，着重论述张伯苓对严复教育救国理论与实践诸方面的继承与超越。肯定了百年来教育救国功不可没，并作为当今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的借鉴。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开拓者张伯苓所创办的南开学校已经一百年了。回首百年，追根溯源。这位北洋水师出身的士官当年毅然弃戎从教，除了甲午战败国耻刺激之外，还应该进一步探索他当时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即不能忽视当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近代教育救国的先驱严复对他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1. 严复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的先驱。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自幼饱读诗书。1872年考入洋务派办的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驾驶。1877年毕业后，去英国 Greenwich Naval College（格林威茨海军学院）留学，并赴法国游历访问。1879年回国后先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成立，严复奉调担任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升任会办（副校长），1891年升任总办（校长）。就在严复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期间，他开始翻译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发表了救亡图强教育救国的各种论著。

1.1 严复译《天演论》及其救亡图强的主张

严复不仅在北洋水师学堂内大量开设西学，讲授科技；而且还常在校内外宣扬西方精神文明与先进思想，进行启蒙教育。自甲午战败后，国危民穷，面临亡族灭种之祸。为救亡图强，他一面积极翻译介绍《天演论》等西方名著，一面又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抨击封建专制

和科举八股，主张变法图强，提倡自由民主，开发民智等等。当时维新派的领袖梁启超称严复为“清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毛泽东在 1949 年 7 月 1 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并列为中共成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1.1.1 严复译《天演论》警醒国人救亡图强

英国人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是为动植物界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规律，于人则有伦理学。严复 1894 年即译此书，着重取其前半部定名《天演论》，并以按语、注释等方式发表己见。他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H·Spemcar）之说，以为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而严复却认为赫胥黎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乃用赫氏“与天争胜”的观点来纠正与补救它。故严复在译书中呼吁：“只要发奋变法，中国仍可得救，存亡生死，其权仍操于我”（《天演论》卷上“人为第四”）。《天演论》译本的正式出版在 1898 年，但在几年以前，各种木刻石印的版本早已在津京等地广为流传。对张伯苓后来的思想影响较深。^[1]

1.1.2 救亡图强之路在于教育

签定“马关条约”的 1895 年，严复先后又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论》等政论，抨击顽固派苟且偷安丧权辱国；全面阐述其救亡图强主张。他依据斯宾塞关于国家强弱标准，在《原强》中提出“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应乃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要其所归，皆以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再联系到当时“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等实情，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项作为救国自强的基本途径。（《原强》，天津《直报》1895.3.4-9）在这三项中，严复又认为首先在于对人民进行新式教育，“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严复致张元济函》第一，1899）。1904 年严复在伦敦与孙中山辩论时仍强调：“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参见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严复晚年时更自号“愈愚老人”，把愈愚当作救国之要务：“继自今，凡可愈愚者，将竭

力竭气蹙手茧足以求之”^[2](《严复集》以下简称《严集》第三册 P563)。

1.2 严复教育救国的实践

严复履行教育救国的实践活动较多,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1.2.1 广义的教育救国主要指严译书、办报刊和论著等活动

严复自 1894 年译《天演论》起,先后翻译的西方名著主要有: H·Spemcer 的《群学肄言》, Adam Smith 的《原富》, J·S·Mill 的《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 E·Jenks 的《社会学通论》, B·de Montesquien 的《法意》等十几部。从康梁等改良派到毛泽东、鲁迅等革命派大都曾受过严译的这些名著影响。蔡元培和胡适都称赞“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申报:《最近之五十年》)。严堪称为近代启蒙教育家之首。

在办报方面,严复 1896 年就曾赞助支持梁启超、汪康年在沪创办《时务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P140),并协助其在华北行销。1897 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周刊,与《时务报》南北呼应。时人评为“北方报纸之最佳者”(同上,P140)。英华敛创办天津《大公报》时,严复曾任股东。另外,他还支持过《知新报》、《湘报》等宣传变法救亡的报纸。这些报刊对广大民众和知识界进行救亡图强和爱国教育等方面都曾起过积极作用。

在言论方面,除了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外,严复于 1898 年百日维新中曾在《国闻报》上公开发表《拟上皇帝书》力主变法图强。当年 8 月严晋见光绪时面陈:“望皇上变法自强”。另外,他还常在校内外讲演,如 1907 年他在环球中国学会讲《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和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讲《实业教育》等言论,宣扬他教育救国和职业教育等主张。

1.2.2 狭义的教育实践 主要指他直接和间接参与的办学和教学活动。严复自 1879 年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开始,1880 至 1900 二十年间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从总教习升至总办。尤其 1891 年严复任总办后,广泛延揽中外名师任教,主要设置英语、数学、物理等格致之学,大开北方风气之先。不仅为国家培养出海军总长刘冠雄等杰出人才,而且还教育和训练出张伯苓那样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教育

家。严复在主持北洋水师学堂期间，于 1896 年起还兼任了清廷在天津开办的“俄文馆”的总办。它实为中国最早的俄文学校。同年，严复还协助张元济创办私立通艺学校。他不仅为该校命名，还曾到该校讲授《西学门径功用》等课。1902 年，严复等人支持马相伯在沪创办震旦学院（今复旦大学前身），1905 年改名复旦公学，因马相伯赴日公干，由严复继任校长。1906 年他又应皖人聘请赴安庆任高等学堂监督。严在这两所学校任职都只有一年左右，皆因经费短缺和校舍不足等原因而辞职。辛亥革命后，严复于 1912 年初出任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监督（校长）兼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当年该校设有经、政、医、农、工、商、格致等科。严在这些科内广引进西学同时，为保存传统文化之精粹，仍在文科中讲治国学。严复主持京师大学堂也只有九个多月，仍因财政困难而辞职离校。

2. 张伯苓对严复教育救国的继承

张伯苓（1876-1951）先世祖籍山东，清初移居天津。家道中落，幼年在宗族家馆和义塾读国学。1891 年张以优异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成为严复升任总办后的第一班学生。他所学驾驶科也正是严复早年所学专业。严复以他留学和多年教学经验，强调学生 15 岁起务必掌握一门外语。“西学既通，无异入新世界”。^[3]教学多用洋文洋书。除校长严复外，总教习伍光建（英国文学翻译家）和苏格兰教习麦克林等人都是张伯苓的恩师。张称赞他们“讲解透彻，更佐以日常人格的熏陶，受业诸生获益非浅”（王文田：《张伯苓与南开》台北传记丛书之二十六）。张伯苓在校时是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他毕业离校后虽然很少与严复交往，但以后仍经常阅读《国闻报》等，接受严复思想和指导。^[4]张伯苓于 1894 年在黄海实习期间亲历甲午海战败绩，1897 年他又在山东亲历英国取代日本强占我威海卫的国耻，目睹两日之间，国帜三易，深受刺激。此后决心脱离海军，弃戎从教。张伯苓对严复教育救国的继承主要表现在思想上深化教育救国的目的和理论，他俩在许多基本观点上大致相同或相近。主要有

2.1 反对日本侵略，坚持抗敌的决心

1895 年严复在《原强》（续篇）中呼吁继续抗击日寇，反对签署

“马关条约”：“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唯有与战相终始，万万不可求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他主张与日本再打“十年，二十年”，终究可以打败敌人。严复当年的这种抗日决心和气概对 40 多年后的张伯苓不无影响。张于 1938 年抗日战争初期痛斥汪精卫等汉奸投降派。他说：“中华民族决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我们只有打下去，在战争中去创造新民族，去建设新国家”^[5]（《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1）下简称《张集》P233）。他呼吁：“中国的兵不溃，全国有自信力，越打力量越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同上，P236）。

2.2 救亡自强途径在治愚 振兴教育

严复在 1895 年疾呼：“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致力斯亟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他痛斥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是为中国贫困落后的病根（《救亡决论》载天津《直报》5.1-6.16）为此需“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还认为在国人痼疾贫，弱，愚“三者之中尤其愈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今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致张元济书》《外交报》1902 第 9、10 期）。张伯苓 1897 年在威海卫目睹国耻后，又在刘公岛看见一位瘦弱萎靡的清兵和一位魁伟英武的英兵形成巨大反差，使他痛感到“欲改革国家，必先改革个人；如何改革个人？唯一的方法厥为教育”（《张集》P134）1917 年 1 月，张伯苓请梁启超到南开讲演后，补充说：“在昔二十年前，以梁先生及严先生论，早已虑及中国之危险，预筹拯国之方”（同上，P35）。张提到二十年前的“严先生论”应是当年发表《救亡决论》等的严复，而非时任贵州学政仅有奏折废科举的严修（范孙）。这表明张伯苓办学多年后仍不忘老校长的教育救国自强之道，并继续以此教育学生。

2.3 都主张三育并进，铸造新人

严复在《原强》中提出“鼓民力”主要是禁鸦片，禁缠足等以培育体力；“开民智”主要是废八股，提倡西学以培养智力；“新民德”主要是倡自由平等，以改铸传统道德。^[6]实际上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促进学生（民众）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张伯苓也认为“改造中

国先改造人，这是总方针……改造什么？改造他的道德，改造他的知识，改造他的体魄”（《张集》P185）。他在办南开学校早期即明确提出：“教育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同上P1）。

2.4 都重视科学实验，并注重中西结合

严复认为封建旧教育的弊病是，偏理论而练习少；偏于艺事，短物理；偏演绎而少归纳（参见《救亡决论》）。他提倡斯宾塞的实科教育，讲求知识的科学性与实用性，重视推广应用培根的科学归纳法。张伯苓也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缺点，为只知用脑而不知用手，故为纸上谈兵。现在中国需要的人才是手脑齐全的”（《张集》P170）他在南开中学建立科学馆，理化生物等仪器为战时全国中学之冠。“竭力提倡科学，其目的在开通民智，破除迷信。”（同上P244）张在天津南开中学曾开设社会调查（观察）课，在重庆南开也常组织学生参观工厂和社区。“惟是科学精神，不重玄想而重观察，不重讲解而重实验”（《张集》P244）。另外，严复《天演论》按语中指出，《春秋》、《易》中含有实验科学的归纳、演绎之学。他从介绍西学批判旧学之始，就努力寻求中西文化之契合点或某些同构关系。^[7]而张伯苓在给南开学生上修身课时也经常引用《易》和《论语》中的名言和圣经故事。“发扬了中华文化并与吸收国外先进教育方法结合起来”（张皓若：《沙坪岁月序》、《光明日报》，2004.4）。这些都表明在教育训练方法上，张伯苓也继承了严复提倡的科学实验，并注意到中西结合。

2.5 都主张缓渐改革 不赞成学生运动

严复在1895年的《原强》提倡变法改良，但他却认为立即“建民主，开议院”。用意虽好，目前无异教病人练快跑，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1919年“五四”时，严认为“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的效果。”；“咄咄学子，救国良苦，……它日绝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世者，则无可决也。”（《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62，载《学衡》第20期）。类似地，张伯苓也认为：“盖凡欲速者，所结之果必不佳；收效迟者其结之果必大而硕。”（《张集》P53）“教育固重要，然其为用迟缓，非旦夕所能获效者。虽然此不过无志者之言。唯其艰难，唯其纾缓，吾人益当振奋斗之精神，刚毅之

魄力从事之”（《张集》P134）。张伯苓虽然常对学生讲国事，但也不赞成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他在1924年，国耻‘五七’纪念日感言中说：“只以手持旗帜游行于街市为爱国，是亦不免过于敷浅矣！”（《张集》P118）。他还认为：“我们的国家受病太久，并不是一天就能治好的，也并不是游行、演讲、开会就能治好大病的。”（《张集》P144）

严复和张伯苓都主张教育救国而不过问政治，但政治却找上他们。两人在晚年都曾一度被卷进政治漩涡之中。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曾将严复列入拥袁劝进的“筹安会”成员名单，而严对“帝制运动，既不否认，也不参加，筹安会每次开会都称病”。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反对帝制后，袁派人持四万元支票送严复诱其撰写驳梁文，严复也拒收。“终洪宪之世独未尝有只字称扬帝制”。然而作为拥袁“筹安会”成员之一，严复也顿失“天下清望”，为一大污点。与严相似，张伯苓于1948年在蒋介石一再催请下，曾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长三个月。虽然他在1949年冬谢绝蒋介石亲临敦促赴台的邀请，坚持留在大陆。但张去南京“一脚踩在臭水坑里”，却也成为晚年之憾事。除了客观原因外，与严、张在主观上都曾一度迷信某个政治强人有关。而张伯苓的得意门生、新中国首任总理在晚年时也曾一度迷信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强人。这些都不应当过于苛责他们的知识分子知遇情结，似还应该再从中国的制度文化等方面去寻求其更深层的原因。

3 张伯苓对严复教育救国的超越

严复在“五四”后两年就去世了，他基本上属于中国近代的改良派人物，其影响主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严复小22岁的张伯苓则有所不同。“五四”时张43岁，南开中学已创办15年，南开大学刚创建。而南开系列学校的辉煌成绩主要在三、四十年代。张伯苓培养的学生大部分都曾为中国现代化效力，不少人还是跨21世纪的人才。故张应该属于中国现代教育家。有人说“张伯苓是康梁时代的人”^[8]笔者未敢苟同。由于张伯苓与严复是不同时代的教育家。尽管他们是师生，都为教育救国奋斗，但在实现其目标的方针、途径、方法等方面，张伯苓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他自己的特点。他在教育救国的理